

人间草木深

张淑清



暮归 汤青 摄

多少年之后，父亲对那棵南果梨树，情同手足，依依不舍。在父亲眼里，梨树已经不仅仅是草木，它有着坚韧不拔的精神，和父亲一起站在时光深处，彼此互相打量。瘦了，胖了，树身体里的年轮，增加一圈，父亲也老了一岁。树是父亲的烟火，父亲是树的依靠。树咬着牙，伫立在那，不东不西。鸟儿来了一波又一波，布谷，麻雀，喜鹊，爱情鸟，有时也来乌鸦。梨树从一棵幼苗，一尺长的时候，就被父亲栽在墙外一道坡地上，身边是一条溪流，虚弱的溪流，有时被干旱枯竭了，过几天，从山里石缝中汩汩淌下来的水，汇成纤细的水流，梨树不寂寞，有溪流陪伴。父亲常来看看梨树，给它量量身高，摘去虫卵，黄昏时，同树说一会话，对视着，让体内涌动着世间的温度。阳光下，梨树和父亲，身影重叠，分不清你我。

时间久了，梨树的脾气传染给了父亲，无论尘世刮多大的风，落多大的雨，或者是出其不意的冰雹，植物们萎靡不振，奄奄一息，与五谷丰登擦肩而过，父亲像梨树一样，对着满目疮痍的大地，沉默寡言。梨树一年年，在春天抽叶，开一树繁华，结出一枚枚果实。由绿变黄，需要三个季节的过程。父亲从大田回来，放下肩膀上的犁铧，依在梨树干上，掏出一块黑乎乎的瓦片，擦掉犁铧的尘埃。鸟儿们开始在树杈筑巢了，喜鹊衔来一根一根树枝，将巢垒成一个椭圆形的，远远望去，像大树托着一只地球仪。诗人和小说家们说，那些鸟巢是另一个村庄，父亲舒服地喘上一口气，吸一枝早烟，吧唧吧唧嘴，一切的心事全在烟里。他不讨厌鸟雀把一泼屎落在身上，只要是生长在梨树上的事物，父亲概不拒绝。蚂蚁沿着树干，向父亲的脖子爬去，它们在父亲充满汗味的肌肤来回巡视。各自相安无事，蚂蚁能怎样呢？既然在梨树和父亲的生命中出现，都是缘分。后来，梨树的果实，一年比一年厚实。许多个青黄不接的冬季，父亲把南果梨，一枚一枚，小心翼翼盛进他编织好的棉槐条筐内，黄澄澄的南果梨，待

嫁姑娘似的，羞答答地坐在筐里，棉槐条的味道，让枯燥的冬天生动起来，父亲戴上手套，裹紧绿色的棉袄，吃过一碗鸡蛋洛水，接过母亲递来的粗布钱口袋，推着木架子车，朝着镇子的方向出发。从我家到镇里有八里地，父亲推着一筐南果梨，意气风发的挺进集口。这筐梨子肩负着神圣的使命，它要为一家人换一袋大米，一袋白面，一壶豆油，准备过年。朴素的父亲，与南果梨如出一辙，筐刚落地，梨子的香气四处张扬。

小镇当时有一座大型的缫丝厂，他们气场强大，不但有宏大的厂区，还有职工家属楼，缫丝厂将小镇推上了经济浪潮的顶尖，它喂活了小镇的商铺，几条大街，影院和图书馆。小商小贩们的吆喝声，每一天都将小镇塞得满满登登。南果梨绵软可口，可父亲也不知市场价格，有人问，梨多少钱一斤？父亲脸憋得通红，支支吾吾半天才挤出一句话，你说多少钱就多少钱。大伙看着父亲淳朴的装束，有主持公道的汉子说，老百姓管理梨树也不容易，水果摊上卖一块五一斤，咱们就给两元吧，这梨的品相好。

一呼百应，父亲没带秤，有人在卖菜的手里借来一杆秤，有帮秤梨的，有帮撑袋子的。一袋烟工夫，梨卖完了。父亲也没敢数卖了多少钱，反正厚厚的一沓，揣在贴身衣裳兜里，又去议价粮店买了一袋米、一袋面、一壶豆油，经过一家老式面包房，迟疑了五分钟，还是买了两个面包嚼嚼，又嘱咐老板用纸包了四个面包回家。出锅不久的面包，散发着浓郁的麦香，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面包。年，因为梨子的功劳，显得丰腴了一些。梨树是我们家的功臣，父亲把它当作兄弟，除了精心呵护，更珍惜彼此肝胆相照的岁月。

在父亲眼里，树是有灵气的，你用刀划它一下，它会疼，会流血。少不更事，我和弟弟曾用弹弓射杀梨树上的果子，射杀麻雀、黄鹌鸟，也在树枝上打秋千，听树杈咔嚓断裂也不知心疼。闯了祸，自然免不了挨父亲的巴掌，父亲每打我们一巴掌，便问一句，疼不疼？你都疼，树能不疼？砍你脚趾头试试？十指连心呐！树一定疼死了，父亲每说一句，叹息一声，好像弹弓小刀不是划在树上，而是划在他的身体里。

父亲也不许牛马拴在梨树上，他怕牲口啃了梨树。母亲偏偏喜欢将切好的咸菜，放在土篮里用一根绳子悬在树上，看着咸菜慢慢被阳光晒干，偶尔也挂一个网兜，晒河鱼海鱼。树疯长，一抱粗的时候，父亲老了，树也不年轻了，结的果实干干瘪瘪，不饱满。小镇的缫丝厂也迁徙到县城，人去楼空，商铺关了一些，市面上南果梨四季不断，却不是真宗的南果梨，父亲不再卖南果梨，选好的梨，码在竹篓里，等着儿女回去吃，吃不了打包带走。老了的梨树，仿佛一匹老马，泊在原地，安静地看着老房子越来越老，父亲的脊梁愈来愈弯曲。我结婚前，父亲有意伐倒梨树，做一套家具给我做嫁妆，我没要。我清楚，这棵和父亲朝夕相处半个世纪的梨树，就像父亲的左手，左手和右手是永远无法分离的。

我做了一只候鸟后，在故乡与城市之间，飞来飞去。城市的高楼上没有草木，阳台上有限的面积，养着几盆花草。移植在城市大街小巷上的树木，总脱不了一身粉红色的胭脂气，尽管有鸟鸣在早晨和傍晚响起，少了炊烟的支撑，草木与我就有了不可逾越的距离。生存在城市的草木，和我何其相似？我不能像父亲那样，赤着脚坐在梨树下，眯着眼端详着他的土地，让脸上的每一条褶子都氤氲着大地与草木的香气。很多个夜晚，月色清凉，车站外面依着墙根睡着的外乡人，他身边瘪着的行囊，数次打湿我的眼睛。我们在不一样的命运中，却过着如此相同的日子，碗里盛着世事，杯中装着乾坤。

回乡下每走一遭，父亲便早早地站在村口，站得久了，就像一棵树。他其实就是一棵树，一路为我们遮挡风雨，把阳光和绿荫丝毫不差地送给儿女。我为什么不学父亲？在心底栽一棵树，让生命强壮起来，走过一场又一场的沙尘暴和龙卷风，根扎地核，谁也动摇不了。半生归来，值得庆幸的是，手里尚有几亩地，老宅还在，在风和日丽的天气，我还可以和园里的草木做一番深沉的倾诉，然后，任草木葳蕤，烟火升起。

初升的太阳，就像舞台照灯，透过窗户，投射到我家客厅正在哭闹的小孙女囡囡身上。坐在沙发上看手机视频的妻子抬头，摘下老花镜吓唬道：“叫花子来了，再哭让他抱走。”

我拿着刚洗好的奶瓶从厨房出来，果然见一位驼背老乞丐站在门口，嘴里嚷道：“老板，行行好，讨点吧。”

我腾出湿漉漉的右手在裤腿上擦干，从衣袋里摸出一元硬币递给他，老乞丐转身拄着竹棍离去。妻说，老乞丐在这条街讨饭十多年了。想当年，刚搬来时，有一次，我从卫生间出来，冷不丁发现脏兮兮的老乞丐站在门口，吓死我了。为了早点打发他走，我给了他一张五元钞票。

这世界变化真快。三十多年前，我们一家人挤在大屋里一间十几平米的厢房居住，节假日还经常呼朋唤友来家里玩，用煤油炉在门口炒菜，油酥花生米，辣椒炒肉，西红柿炒蛋，大家喝酒聊天，吃得津津有味。每到饭点，隔三差五就有叫花子上门乞

讨。我会往他们破碗里扒点饭菜，或舀半碗米倒在乞丐吊在胸前的布袋里。不打发叫花子是不走的。他们会扬手“哗叭哗叭”打快板，边打边唱乞讨歌。现在住上别墅，厨房电气化了，人却越来越懒。来客、做喜事全上酒店，鸡鸭鱼肉，少人问津。偶有讨饭的上门，他们不要饭菜，专讨零钱。

几天后，老乞丐又上门乞讨，我在衣袋摸了半天没找到硬币，便抽出一张拾元纸币递给他。妻上前夺下钱，

把桌上囡囡吃剩的一块蛋糕递给他。老乞丐未接，叹息一声离去。我

责怪她过分。妻反驳道：“以前讨饭的不都是吃剩饭剩菜？”

我说：“以前骑自行车，现在开小轿车，能一样吗？”

妻又说：“叫花子不受惹，给惯了会经常来。”

我说：“不就是一点零钱吗？又不是给不起。”

妻提高了嗓门：“一分钱难倒英雄汉。别人看见叫花子来都赶紧关门，就你大方。”

“别人不想发财，你也不想发财？”

老乞丐

杜维民

